

国际关系

# 启蒙时代早期欧洲知识人的 殖民地科学探险与旅行书写

——以拉·孔达米纳对南美洲的探险考察为例

陈日华 刘葭妍

**内容提要：**启蒙时代早期，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与科学研究的需要，欧洲掀起了知识人赴殖民地探险的热潮，1735年法国科学院派出的秘鲁大地测量团正是其中一例。拉·孔达米纳作为该测量团的领袖，领导了地球赤道弧度的测量，并且撰写了沿亚马孙河流域的旅行文学作品。拉·孔达米纳将探险活动的全部荣誉和成果都冠以法国国王的名字，并将探险目的的科学性视为法兰西文化先进性的表现。在探险过程中，拉·孔达米纳对殖民地的植物进行了整理分类，试图借助殖民地测量数据定义公制度量单位，并且对原住民族群展开观察。其旅行书写则记录了这些活动，并用启蒙话语阐释了上述活动的意义。考察其科学探险和旅行书写可以发现，此时欧洲的知识人以理性为工具，以殖民地为研究对象，正在尝试建构适用于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则。这种规则的建构维护了旧的殖民秩序，并为拥有文化优势的帝国提供了归化与驯服的新的殖民手段，从而导致被殖民者的文化沦落为从属地位。

**关键词：**启蒙时代 旅行书写 大地测量团 法国科学院 后殖民主义

**作者简介：**陈日华，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葭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1)05-0075-22

18世纪上半叶，在南美洲的土地上，几大帝国的统治疆域已经大体确定。尽管新兴的英法两国绞尽脑汁想要参与南美富饶矿藏的分割，尽管西葡两国的庞大统治已经变得腐化且臃肿不堪，从《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签署以来的殖民秩序已经垂垂老矣，但它却远未到分崩离析之时。在之前的200余年内，军人和探险家在无所属的新大陆上开疆拓土，将帝国的边界线向最遥远的地方延伸，而帝国的商人和船队则在西印度航线上奔忙，为整个欧洲带来了惊人的财富。

“我们的财富哺育了欧洲和当地首领的繁荣”<sup>①</sup>。对美洲人来说，这句话并不算夸张。但在帝国的子民眼中，他们的同胞，那些新大陆的征服者们，尽管他们中的一些残暴、贪婪、不够体面，但无论如何都应当被视作英雄，而非被哺育、被赠与的对象。在“发现”新大陆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征服者都宣称他们为美洲带来了文明、教化和福音，怀着一种主人翁的激情，要用“真正的信仰”来改造这片蒙昧黑暗的大陆。然而，想要在帝国扩张的边缘地区开展单向的文化输入是不可能奏效的。帝国与殖民地的接触地带不可否认地会发生各式各样的征服与反征服、支配与反支配，在两种文化互相碰撞和斗争期间势必会造成对“他者”有限的浸染，也势必会使“自我”成为被浸染的对象，亦即会发生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所指出的那种“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sup>②</sup>，帝国在审视殖民地、影响殖民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到被审视者的反向影响。

单向文化秩序的最先挑战者是西印度移民和他们的后代。随着殖民地印刷业的兴起和欧洲式大学的建立，饱受欧洲文化影响的美洲白人及其后代获得了与欧洲人同等的文化背景。当这些操着欧洲人熟悉口音的人们因为公务或者学业离开殖民地回到欧洲大陆的时候，也就不自觉地携带了殖民地的声音。“Cacique”（酋长）、“Canoë”（独木舟）、“Chocolat”（巧克力）等源于印第安语言的单词都出现在了美洲白人的口语中，并且随着他们的文化活动，

<sup>①</sup> [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页。

<sup>②</sup> [美]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译：《帝国之眼》，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9-11页。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说的“反征服”是殖民地对殖民者文化输入行为的反抗，而玛丽·路易斯·普拉特使用的“反征服”则是指殖民者对自己的征服行为进行修饰，从而建构一个无辜的殖民帝国的“自我”过程。

逐渐被广泛的欧洲世界所接受。<sup>①</sup>除了这种被动的、潜移默化的文化反作用，殖民地的文化也会被帝国主动接受，其主要的实践者是早期的传教士。16世纪初，传教士纷纷前往新大陆，掀起了欧洲人学习印第安语的第一波热潮。<sup>②</sup>为了与当地原住民进行语言交流以获得原住民的认可和信任，也为了更有效地传播“上帝的慈爱”，传教士学习了包括克丘亚语（Quéchuá）、卡坎语（Cacán）、艾马拉语（Aymara）在内的各类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sup>③</sup>。与此同时，传教士们观察和尊重印第安人的习惯，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融入了印第安人的社区中。这些传教士的心得和日记回流到欧洲，提供了一种相对平和且生活化的殖民地叙事，与那些探险家和投机者书写的那种以支配者视角叙述的充满奇特轶闻和残忍战斗的游记作品一起，构成了欧洲人对新大陆的最初想象：一片混杂而无序的土地，这里的原住民时而体现出“高贵的野蛮人”那种纯净和善良，时而又表现出粗鲁凶残与愚蠢。一个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彻彻底底的“他者”诞生了。到了启蒙时代，受笛卡尔和牛顿自然哲学的影响，欧洲科学研究者试图探索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在哲学上的统一。因而在对殖民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欧洲的知识人<sup>④</sup>接过了传教士和探险家的接力棒，成为殖民地的崭新凝视者。以殖民地为分析和审视的材料，欧洲知识人通过不断描摹、刻画和改造殖民地的形象，逐渐确认了殖民地的“他者”身份。又通过不断审视这个“他者”，不断明确“他者”与“自我”的界限，不断阐释两者间界限形成的原因和必然性，以创造一个更加鲜明的欧洲形象。

国内目前对启蒙时期知识人的殖民地探险研究，主要集中于林奈及其学生的殖民地生物考察以及洪堡的美洲探险，较少关注到18世纪早期的法国大地测量团。王晓德教授在《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及其影响》<sup>⑤</sup>以及《雷纳

① [英] 莱斯利·贝瑟尔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二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328页。

② Oswaldo Szemerényi and Bela Brogyanyi, *Prehistory,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Language, Speech and Linguistic Theory*, Amsterdam: J. Benjamins, 1992, p. 74.

③ Christophe Giudicelli, “Speaking the Enemy Language: The Solitude of the Missionary in Calchaquí Lands”, in *Tempo*, Vol. 19, No. 35, 2013, pp. 43–64.

④ 本文采用“知识人”一词遵照法语原文 *Gens de lettres* 译出，其中复数的 *lettres* 意为知识，遵照字面翻译即有知识的人，以区别于不会读写的人。而狭义的“知识分子”，即 *Intellectuel (le)* 一词，则迟至19世纪末才见使用。

⑤ 王晓德：《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及其影响》，载《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36–153页、第192页。

尔美洲退化思想与启蒙时代欧洲的“他者”想象》<sup>①</sup>中，考察了欧洲知识人借助殖民地探险材料，将“想象中”的美洲囊括进欧洲叙事的努力，其中对法国大地测量团成员的旅行书写文本有所涉及，但并未将其作为主体进行研究。而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南美洲在呼唤他们：伟大的博物学家的探索》<sup>②</sup>一书介绍了1735年法国大地测量活动的始末，《测量新世界：启蒙科学与南美洲》<sup>③</sup>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不局限于讨论探险过程本身，而是将叙述的地理范围从大地调查团的足迹扩展至欧洲本土的图书馆、沙龙、宫廷和植物园；并通过文字和图像展示了此次旅行的账目、地图的绘制、材料的选用过程，将启蒙时代知识人通过殖民地探险以加入跨大西洋的知识流动过程完整地展现出来。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sup>④</sup>直接将旅行书写作为研究对象。作者指出，在帝国的边缘，与帝国对殖民地反征服叙事的同时，也存在着殖民地对帝国文化的反向影响，即“文化互化”。按照时间维度，作者将19世纪之前知识人的旅行书写总结为在科学研究诉求下以欧洲为中心的行星意识（planetary consciousness）的反征服。这些文本将殖民地社会进行去社会化的解读，将之视为自然的、伊甸园式的人间天堂。因此，风景被审美化，物质和语义等名词高度稠密。观者，即帝国的目光，隐含着对被观测者的权力控制。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认为，拉·孔达米纳的旅行文本采用了生存文学式文体，这种文体是前林奈分类法时期欧洲人构建行星意识的不成熟产物，其目的在于用审视的目光将殖民地置于帝国的“科学性”审视之下。但由于字数所限，作者并没有对拉·孔达米纳的作品文本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批判，而只是将其当作19世纪之前知识人中的一员进行了有限的介绍。与后殖民主义研究类似，本文关注殖民地对帝国自身文化建构的作用，这一点与萨义德《东方学》中所提到的“（东方）……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sup>⑤</sup>相似，并且依据相似的属性将

① 王晓德：《雷纳尔美洲退化思想与启蒙时代欧洲的“他者”想象》，载《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第177-188页。

② 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 *South America Called Them, Explorations of the Great Naturalists: La Condamine, Humboldt, Darwin, Spru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5.

③ Neil Safier, *Measuring the New World: Enlightenment Science and South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④ [美]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译：《帝国之眼》，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二章。

⑤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7页。

“东方”的范围推及美洲殖民地。

与传统东方主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非旨在解释帝国与殖民地之间二元对立的表述系统，亦非旨在强调殖民地书写与帝国殖民者的同谋，而是在承认上述文化机制及其背后的政治机制的同时，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对殖民地的科学探险和旅行书写文本进行分析，着力探究启蒙时代早期殖民地审视的历史性的特殊视角。与此同时，本文以法国知识人拉·孔达米纳为例，考察其1735—1744年在秘鲁展开的科学探险活动及其沿亚马孙河而下到达美洲东海岸的旅行书写，旨在借助拉·孔达米纳作为启蒙时代文化中心地区和中心阶层一员的代表性身份，以展现启蒙时代早期欧洲知识人殖民地审视中较为普遍的特征，考察其将殖民地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纳入世界解释体系的成败，揭示这一行为背后隐藏的文化殖民主义内涵。

## 一 科学探险与“法兰西荣誉”

1735年伊始，法国皇家科学院（简称法国科学院）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了一项充满野心的探险计划：两组由法国年轻科学研究者组成的大地测量团，将分别前往位于极圈附近的拉普兰和位于赤道上的西属殖民地城市基多，同时使用三角测量计算子午线的弧度，并与在巴黎附近测出的弧度相对比，从而一举解决地球形状的谜团。这一探险计划在提出后立即获得了执行，法国科学院选择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莫佩尔蒂前往北极圈，而他的好友拉·孔达米纳则率领一支小队前往基多。拉·孔达米纳将这次科学探险描述为一次壮举：“当国王陛下的军队在他盟友的协助之下横穿欧洲大陆，他的数学家则散布在世界各地，在炎热与极寒之地工作，为了科学的进步，也为了各国的共同利益。”<sup>①</sup>

这场探险的目的在于终结地球形状之争——以卡西尼父子为代表的法国科学研究者坚信地球的形状近似于橄榄，两极凸出而赤道平坦，这一理论受到了牛顿的挑战，后者提出了与前者完全相反的构想。让·多米尼克·卡西尼设想的地球形状并不是第一次受到挑战，早在17世纪末，他的助手让·里

---

<sup>①</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V.

歇在法属圭亚那的测量就已经证明赤道的弧度并非想象中那么平缓。<sup>①</sup> 尽管卡西尼将其助手斥为“伪君子”和“叛徒”，但这份矛盾的数据并未得到法国科学院的重视。<sup>②</sup> 实际上，让·里歇的测量结果无意间证实了牛顿的理论，而後者的著作自18世纪3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使得法国皇家科学院丧失了颜面。这场争端与其说是卡西尼与牛顿理论支持者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以法国科学院为中心的法国知识界与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中心的英国知识界之争。英法两国长期以来在文化领域的矛盾必然会在科学理论这片土壤埋下不和的种子，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之后，英法在政治上愈演愈烈的对立更加剧了不和。路易十四时代法兰西文化傲视群雄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法国科学院想要在科学领域保持优势以维护法兰西的民族尊严，就不得不抢在英国皇家学会之前，尽早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法王路易十五欣然接受了法国科学院的申请。除了英法科学界之间的竞争，与波旁西班牙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是批准这次科学探险的原因之一。在此前的两百年内，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实行了高度封闭的政策，对一切外国人入境都进行严格的审查。尽管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的统治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尽管殖民地脱离伊比利亚半岛统治的趋势不断加强<sup>③</sup>，但仍（或者说正是由于这样的现状）导致西班牙越发坚定地隔绝于欧洲，并且将其殖民地置于严密的监管之下。法国想要重新涉足拉丁美洲，1735年的大地测量正是一个契机。或许是出于对路易十五的尊敬，或许是为了革新西班牙王室腐朽陈旧的形象，又或许是对科学研究怀有极大的兴趣，菲利普五世应允了法国科学院的请求，并且派遣两位船长豪尔赫·胡安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为之提供向导和行政上的帮助。两位西班牙船长跟随团队进行了测量，并且确保法国人的活动仅限于科学范畴之内，而不会从事间谍或颠覆活动。拉·孔达米纳团队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数学家皮埃尔·布格（Pierre Bouguer）、天文学家路易·戈丁（Louis Godin）以及随行的助手和外科医生。<sup>④</sup>

① [法] 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路易十四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61页。

② Victor Wolfgang von Hagen, *South America Called Them, Explorations of the Great Naturalists: La Condamine, Humboldt, Darwin, Spruce*, London: Robert Hale, 1949, p. 8.

③ [英] 莱斯利·贝瑟尔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328-329页。

④ 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VII.

1735年3月11日，拉·孔达米纳的团队离开法国西部港口拉罗谢尔，怀着极大的使命感，肩负着法兰西的荣誉，正式踏上了前往秘鲁的旅程。<sup>①</sup> 在法国科学院原本的计划中，这项考察需要花费3年的时间，然而实际上，拉·孔达米纳的大地测量团共用了8年时间才完成观测。据他记录，在赤道以南城市昆卡的测量要到1743年3月才结束，而此时，前往北极的拉普兰大地测量团已经回到了巴黎，汇报了最终的测量结果：牛顿赢了。因此，他的团队所获得的数据已经不具备率先解决争端的特殊意义，而只是再次确认地球形状这个已知事实罢了。团队中一度出现争执，拉·孔达米纳表示，如果他的领导被足够尊重的话，“那么我们在好几年前就应该回到家中了”<sup>②</sup>。最终，他的团队成员决定分别进行各自的研究，并且自行回到欧洲。1744年，皮埃尔·布格成为测量团中第一个回到巴黎的人，他于11月14日在法国科学院举办的公众集会上发言，并且在5年后出版了有关本次测量的回忆录和技术细节说明《大地的形状》<sup>③</sup>。路易·戈丁则在完成测量后留在了利马，并见证了1746年的利马—卡亚俄大地震<sup>④</sup>，当他于1751年回到欧洲时，已经被公众淡忘。西班牙人豪尔赫·胡安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几度辗转也返回了欧洲，两人合著的关于南美洲殖民政治状况的观察记录《美洲秘闻》揭露了秘鲁总督统治下的腐败<sup>⑤</sup>，直至西班牙帝国土崩瓦解后才被公开，而德乌略亚的回忆录《南美洲之旅》由西班牙国王授意于1747年出版，并被翻译成英文，收录于约翰·平克顿的《航行与旅行总集》中。<sup>⑥</sup>

拉·孔达米纳作为团队的领导人，并没有急于回到欧洲汇报成果，而是将这份荣誉让给了皮埃尔·布格，自己筹备从基多往南穿过安第斯山区、沿马拉尼翁河顺流而下完成对亚马孙河流域的内陆探险。在他之前，只有极少

<sup>①②</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p. 9 - 14, p. 96.

<sup>③</sup> Bouguer and Charles - Antoine Jombert, *La Figure de la Terre; Déterminée par les Observations de Messieurs Bouguer, & de la Condamine, de L'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nvoyés par Ordre Du Ray au Pérou, Pour Observer Aux Environs D L' equateur. Avec Une Relation Abregée de Ce Voyage Qui Contient la Description Du Pays Dans Lequel Les Opérations Ont Été Faites*, Paris: Chez Charles - Antoine Jombert, 1749.

<sup>④</sup> Larrie Ferreiro, *Measure of the Earth: The Enlightenment Expedition that Reshaped Our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p. 47.

<sup>⑤</sup> Juan Jorge and Antonio Ulloa, *Noticias Secretas de America*, Madrid: Dastin, 2002.

<sup>⑥</sup> Antonio Ulloa, John Adams, and John Pinkerton, *A Voyage to South America: Describing at Large the Spanish Cities, Towns, Provinces, & c. on That Extensive Continent; Undertaken, by Command of the King of Spain, by Don George Juan, and Don Antonio De Ulloa*.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and Orme, 1813.

数探险家深入过南美内陆，而他们的探险仅仅是为了传教或者拓展领土，还从未有人对亚马孙河沿岸的生物、矿产和水文条件进行过科学考察。在他看来，进行这样一次前无古人的探险，或许能补救未能率先证明地球形状的遗憾，同样有利于法兰西的荣誉。最终，拉·孔达米纳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任务，以第一位对亚马孙河流域进行考察的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回到巴黎。伴随他回到巴黎的，还有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植物植株或者种子、动物样本以及印第安制品的制作步骤，这些“宝藏”将带来技术上的革新、科学上的进步和潜在的经济利益。1743年6月3日，拉·孔达米纳在卡萨努马山区（Caxanuma）度过了一整天，“挑选适合运输的8~9株金鸡纳树植株”，此前他已经将发现这一可以有效提炼奎宁的新物种的消息发回了法国科学院。<sup>①</sup>拉·孔达米纳自述将它们“连着泥土挖掘出来，放入大小适当的盒子中，让一个印第安人小心扛在肩上，置于我的视线之内，直到将它运送登船……运送回法国，献给国王的花园”<sup>②</sup>。尽管金鸡纳树植株最终在旅途中遗失，但是拉·孔达米纳作为该植物的发现者而被林奈记载在《自然体系》（*Systema Naturae*）一书中。<sup>③</sup>与金鸡纳树一同成为“国王花园里的珍奇”的还有两种致幻植物：一种近似于曼陀罗（*Floriopondio*），一种是果实类似豆荚的高大树木（*Curupa*）。<sup>④</sup>此外，还有能作为东方香料替代品的芳香树木、印第安毒药和毒药的解法、种痘免疫疗法、橡胶树以及印第安人取橡胶树液的传统工艺。<sup>⑤</sup>这些植物尽管名义上是献给国王的“花园里的珍奇”，但经法国科学院的研究，最终都应用到了相关行业中去。在殖民地的舞台上，拉·孔达米纳以及其他的科学工作者通过科学探险，不断发掘殖民地的科学研究价值，以填补欧洲人认知上的空白。将殖民地作为研究材料，欧洲知识人对殖民地的物质世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审视。然而，启蒙时代的知识人并不满足于博物学家式地广泛认识世界，更试图创造一个解释万物的井然不紊的世界秩序。而新秩序的建构

① Joseph de Jussieu, *Description de L'arbre à Quinquina / Mémoire Inédit de Joseph de Jussieu*, Paris: Société du Traitement des Quinquinas, 1936.

②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p. 13 - 14.

③ Frederick B. Power, "The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 of Elaterin", in *The Pharmaceutical Journal and Transactions*, London: J. & A. Churchill, 1875, Vol. V, p. 647

④ William Edwin Safford, *Narcotic Plants and Stimulants of the Ancient American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7, p. 396.

⑤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过程中自然需要考察殖民地这片新近被发现的“世界的一部分”。

## 二 欧洲知识阶层构建物质世界“秩序”的努力

拉·孔达米纳将大多数的动植物记录送到了他的朋友、瑞典分类学家林奈的研究室中，这些罕见的南美洲奇异物种为林奈修正其动植物分类系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科学的进步，也为了各国的共同利益”，拉·孔达米纳此举履行了为法兰西效忠的义务，也履行了他作为“科学共和国”<sup>①</sup>公民的责任。在这中间，他幸运地维持了两者的平衡，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在18世纪的西欧，拥有“对科学和国家的双重忠诚”几乎是科学工作者的普遍素养<sup>②</sup>。具体来说，就是在保持对自身民族和国家的热爱、为“国王的花园”增光添彩的同时，积极参与欧洲学术圈的事务。拉·孔达米纳无疑意识到了自己与一个跨国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他在记录自己的科学测量时如是说：“正是在这座岛屿（卡宴），里歇先生……首先证实了牛顿和惠更斯的理论……拜德·迈兰在巴黎测量的准确结果所赐……戈丁先生、布格和我也将得出准确的结论。”<sup>③</sup>拉·孔达米纳提到的一连串科学工作者，有些是法国人，有些则不是，但他们的共同身份都是致力于探寻地球真正形状的知识人。借助相同的地点，拉·孔达米纳将自己与17世纪已经去世的让·里歇联系起来，又借助一种同时性（Synchronicity）的观念，使自己与远在巴黎的其他科学工作者息息相关。拉·孔达米纳与其测量团成员的研究目的，对地球真正形状的好奇、对未知知识的渴求和对真理的信仰，将他们与包括牛顿和惠更斯在内的、一切并非身在同时同地的科学工作者们，都囊括入一个

<sup>①</sup> 关于“科学共和国”的概念，参见 Roger Hahn, *The Anatomy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ion: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1666-180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这一说法与“文人共和国”类似，前者可以看作这个概念在启蒙时代强调科学工作者主体身份的合理引申。根据对“文人共和国”概念的不同定义，可以上溯到不同时期寻找其源头。近年来强调女性组织沙龙和维系文人联系的身份的观点认为，妇女角色的变化是知识阶层建立“文人共和国”的重要因素。参见 Susan Dalton, *Engender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Reconnecting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P, 2014.

<sup>②</sup> Roger Hahn, *The Anatomy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ion: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1666-180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4.

<sup>③</sup> 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p. 100-101.

更大的团体中，构成了一个“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知识界”<sup>①</sup>。启蒙时期的欧洲知识人，尽管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有所不同，观点也时有冲突，但绝不是零星地各自为政。在相通的学术语言（一开始是拉丁语，随后转为法语）、相似的研究路径（注重普遍意义的才智而不求某一特定领域的钻研）与知识机构逐步建立（以各国的科学院为主）的基础上，模糊的“文人共和国”向事实上的“知识阶层”的转变已经呼之欲出了。

刺激欧洲知识人进行联合的，是“世界”的扩大。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地理意义上的“世界”版图逐渐扩张，而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人类思考问题的深度更是远胜于前。前所未有的大问题困扰着欧洲知识人，结成切实的研究团体似乎是唯一的解决路径。因此，在拉·孔达米纳的科学探险中得以广泛地参考前人探险的资料和地图成果：“关于这条（马拉尼翁）河，桑松绘制的地图有很多错误……但却被很多地理学家复制到了他们的著作中去。”他最常提及的是萨姆尔·弗利茨（Samuel Fritz），一名在马拉尼翁河流域传教的德国耶稣会士，但是弗利茨绘制的地图中对河流长度的测量数字并不准确，并且“附有比较少的笔记，也几乎没有历史的记载”<sup>②</sup>。同作为知识界的一分子，拉·孔达米纳感到自己有资格、也“理应完善”其他地图绘制者的成果。而在秘鲁的博尔哈，拉·孔达米纳也为遇见“同胞”而欣喜：“应尊敬的神父马格宁<sup>③</sup>的邀请，我留在博尔哈……我在这里见到了文明与善良，这正是我期待中同胞与朋友的样子。”<sup>④</sup>随后，拉·孔达米纳又遇见了克里奥尔人探险家佩德罗·马尔多纳多（Pedro Maldonado），两人成为好友，并且同行前往欧洲。正是由于欧洲知识阶层的联合、同为“科学共和国”公民的亲切感，才使得拉·孔达米纳能在肩负着“法兰西荣誉”的同时，依然将马格宁与马尔多纳多等人视作“同胞与朋友”。

可见，启蒙早期逐步形成的“知识阶层”绝不仅仅是众多单独的知识人个体的总和。从模糊的概念到事实上的联合，从复数的个体到单数的集体

<sup>①</sup> 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

<sup>②</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p. 7 - 8.

<sup>③</sup> 胡安·马格宁（Juan Magnin），耶稣会士，出生于瑞士弗莱堡，传教士、编年史家、制图学家，于1744年和1777年两次将其为日心说辩护的作品献给拉·孔达米纳。

<sup>④</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29.

(或言“阶层”), 欧洲知识阶层内部普遍的认同感催化了这种转变, 并在这种转变中不断磨砺和自我完善。这种认同感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启蒙时代早期, 可以总结为对人类理性和普适真理的信仰。对人类理性的信仰一方面受笛卡尔哲学的唯理主义指导, 另一方面又受到洛克和牛顿的经验主义影响。18世纪的欧洲知识人大多徘徊在这两种学说之间, 不得不采取折中的方式, 既支持休谟所说“人是理性的存在物”, 也相信“人还是行动的存在物”<sup>①</sup>。但说到底, 所有的欧洲知识人都坚信, 人有办法通过努力(无论是广义上的人的理性还是狭义上的“笛卡尔主义”中的理性)获得真理。同样, 尽管对真理的定义各不相同, 但“真理是自明的”<sup>②</sup>, 是与其余表象区分开来、必然可知并且必然存在的。很多情况下, 知识人们不得不面对语言、教派和国家等各方面的矛盾, 但是他们坚信, 确实存在“某种科学”在呼召他们, 尽管通向它的道路不一而同, 甚至连它的形态都还未有定论——但是, “除了理性和一支更有力的笔之外, 没有什么上级”, 真理的呼召使得他们能够走出原本各自属于的不同阵营, 而单凭理性进行思考。<sup>③</sup>

对理性的乐观态度使得这一时期的知识阶层迫切地追寻真理的呼召, 而想要更好地解释世界, 就需要建立起一套普遍适用的规则, 以更加顺畅和规范地进行研究。启蒙时代的欧洲知识人将要做的, 正如创世时亚当的第一件工作——给万物命名。不同的是, 此时的万物并非没有名字, 而是名字太多: 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组织之间, 各自遵循着不同的命名方法, 因而同样的物种可能会有多个不同的名字。另一个难题是, 对于那些暂未发现的物种, 将要依据什么样的规则进行命名? 这种混沌的状况应该得到纠正, 欧洲知识界正在酝酿一个“哥白尼式”的新的物种命名体系, 而殖民地这块旷阔世界中尚未被人类完全了解的一部分, 正是启蒙时代知识人建立新机制的最佳试验田。拉·孔达米纳写道: “我敢说, 从科迪勒拉山系安第斯山脉直到海边, 我在亚马孙河流域见到的众多各异的植物和树木, 足够大多数植物学家研究上好几年了。”<sup>④</sup> 他想起了好友林奈的动植物分类计划: “我们现在真正需要做

① [英] 大卫·休谟著, 周晓亮译: 《人类理智研究》,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 第4页。

② [荷兰] 斯宾诺莎著, 贺麟译: 《知性改进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年, 第35页。

③ 参见 [英] 彼得·伯克著, 陈志宏、王婉旎译: 《知识社会史》(上卷),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31页。

④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37.

的，就是对这些植物进行区分，将它们各自分类，并且包含到合适的属和种中。”拉·孔达米纳提到的这种分类法正是1735年林奈第一版《自然体系》<sup>①</sup>中的“双名法”分类法，这是一种以拉丁语为基础的，包含属名、种小名以及命名者姓名缩写的动植物命名系统。拉·孔达米纳有意识地在旅途过程中收集各类动植物信息，并且对它们进行客观详细的观察和描写，为知识界进行动植物分类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自己也成为他发现的几种新物种的命名者<sup>②</sup>。

除了对生物进行命名和分类，另一项规则的制定也同样重要：统一的国际度量单位。由于各国通行度量单位的混乱，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的跨国合作中不得不进行复杂的换算。而有些时候，国家的统治者还会对其通行度量进行调整，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国际间单位换算的难度。拉·孔达米纳在测量河流长度时就遇到了这种问题，为此，他不得不通过估算，将17世纪初耶稣会士进行的长1356西班牙里格的航行，换算成“大概1500海里多，约合我们法国的1900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拉·孔达米纳提出了“共有的、稳定的且相互沟通一致的”单位，以克服不同国家使用不同重量和尺寸单位而带来的阻碍。他将度量的混乱与语言的各异相类比：“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不正是语言的不同所带来的不便阻碍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吗？”在他看来，想要使欧洲科学发展到更高的高度，就必须解决度量单位的混乱局面，必须使欧洲知识界遵循统一的规则，无论是生物界还是非生物界，都必须有一套各国通行的、能够被广泛识得且认可的秩序。为此，他建议以秒摆在赤道上的摆长这一常数作为基准，用以计算出其他所有的公用度量单位。<sup>③</sup>

欧洲知识阶层这套解释物质世界的规则确实为其科学研究的进行提供了便利，然而无形之中，他们建起的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发展的“巴别塔”，更打开了知识界殖民主义的“潘多拉魔盒”。这样一套秩序的建立使得欧洲成为了规则的制定者，尽管欧洲知识人本意未必如此，但他们确实定义了新的秩序。定义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新的秩序必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借助生物命

<sup>①</sup> Carolus Linnaeus, *Systema Naturae, Sive Regna Tria Naturae Systematice Proposita per Classes, Ordines, Genera, & Species*, Leiden: Haak, 1735, pp. 1-12.

<sup>②</sup> William Edwin Safford, *Narcotic Plants and Stimulants of the Ancient American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7.

<sup>③</sup> 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101.

名系统和国际度量单位，欧洲确保了它始终“在场”：在任何语境下，使用这样一套话语方式就意味着对欧洲的服从，而只有这一套话语方式才是能被听懂的语言。

### 三 拉·孔达米纳的旅行书写与“风度翩翩”的殖民

启蒙时代的思维方式统治了欧洲知识界，也影响着欧洲的一般民众。拉·孔达米纳向公众强调自己的旅行是一次“理性”的旅行，从而与此前教士和冒险家们的普通旅行区别开来。“我的任务是要绘制一幅我自己的地图，该地图中，一条河流横跨数个区域，而那些区域对我们地理学家来说都是未知的……”<sup>①</sup> 1745年2月23日，拉·孔达米纳从苏里南返回巴黎，此前他在海上遭遇了英国海盗船的袭击，在《南美洲内陆之旅简述》草稿中，他特意提到了与英国海盗的战斗。<sup>②</sup>同年4月28日，拉·孔达米纳在卢浮宫门口举行的法国科学院公众集会上，向巴黎市民宣读了这部长篇报告。<sup>③</sup>拉·孔达米纳的报告受到了巴黎市民的一致好评，因为他不仅介绍了南美洲的“‘野蛮人’、他们的民族、一系列的河流……太阳和星星的高度、纬度和经度、测量单位、考察路线、距离、水深、指南针的变化、晴雨表的指数等”<sup>④</sup> 这些科学性的考察结果，还回忆了此前亚马孙河流域的探险故事，包括寻找黄金国和黄金湖、亚马孙女战士的传说以及血腥可怖的西班牙士兵通过屠戮手足建立起来的贪婪统治。这份同时包含科学性测量研究成果和猎奇性自然冒险故事的报告，揭示了拉·孔达米纳此行被称作科学探险的原因；一方面，它区别于此前的生存纪事、冒险日记或者《鲁滨逊漂流记》这类虚构文学；另一方面，它又不像是布格的《大地的形状》或者后来科学界出现的那种完全严肃的科学调查报告。拉·孔达米纳的旅行书写文体是杂糅不清的，然而正是这种文体的独特之处吸引了更多同时代读者的目光。几个月后，他在法国科学院集会上

<sup>①②</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IX, p. 107.

<sup>③</sup> 该报告原文在1751年出版。关于法国科学院的公共集会，参见 Roger Hahn, *The Anatomy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ion: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1666 - 180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sup>④</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p. IX - X.

的报告以法语出版<sup>①</sup>，两年后该书被翻译成英语，同样大受欢迎，被收录进当时的多部航海旅行相关的文集中，也同样出现在伏尔泰、布丰、霍尔巴赫亦及威廉·罗伯森的书架上<sup>②</sup>。

拉·孔达米纳文中的轶闻对于他的同胞来说，有些已经不算新鲜，但也有一些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与那种专为博人眼球的猎奇读物不同，拉·孔达米纳科学院成员的身份以及他行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静和审视的态度，大大增强了轶闻的可信度。拉·孔达米纳时常运用今昔对比，例如，提到“百年前西班牙建立的辉煌城市，现在逐渐被印第安人部落重新占据”，又例如，“200年前西班牙军队将印加人逼退至内陆的亚马孙丛林中，而200年后，西班牙人的城镇成为废墟，印加人的子孙又重新出现在了沿海的地方。”<sup>③</sup>同样的土地和风景，百年间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拉·孔达米纳的叙述能够激发起读者沧海桑田的感叹。特别的是，在他的叙事中，西班牙帝国总是被淘汰的一方，总是封闭和被动的，总是沉默不语的，在西属殖民地只有停滞。拉·孔达米纳甚至将葡属殖民地与西属殖民地进行了对比。当他到达位于亚马孙河下游的葡属小镇圣保罗时，他指出：“我们开始见到礼拜堂、砖石的建筑、墙壁粉刷得纯白整洁的房屋……所有印第安妇女都穿着英国的棉布……还有眼镜、小刀、剪刀、缝纫针、梳子，以及各种各样产自欧洲的小玩意……与马拉尼翁河上游的那些（西属城镇）完全不同。”<sup>④</sup>在他看来，相比于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的殖民显然是失败的，他们管理粗放、效率低下。在殖民的初期，西班牙的统治残暴血腥。自称为王的西班牙征服者阿奎尔谋杀了手足乌尔苏阿，试图夺取印加人的黄金，然后自己又在乱军中被杀死<sup>⑤</sup>，这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拉·孔达米纳笔下的西属殖民地屡屡发生。通过叙述西班牙统治现状的惨淡，配合以回忆建立统治时期的残酷，拉·孔达米纳证明了葡萄牙帝国的殖民统治优于西班牙，然而这并非他最终的目的。拉·孔达米纳想要引出的，是一个与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征服者”完全不同的新

<sup>①</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Relation Abrégée d'un Voyage Fait dans l'interieur de l'Amérique Méridionale; Depuis la côte de la Mer du sud, Jusqu'aux Côtes du Brésil & de la Guiane, en Descendant la Rivière des Amazones; lûe à l'assemblée Publiqu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le 28. avril 1745*, Paris: Veuve Pissot, 1745.

<sup>②</sup> [英]彼得·伯克著，陈志宏、王婉旒译：《知识社会史》（上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9页。

<sup>③④⑤</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14, p. 45, p. 6.

的“征服”，而这种支配方式“只有理性指导下的法国人才能做到”。

拉·孔达米纳之所以坚信读者能做出与自己相同的价值判断，是因为他认为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一种默契。一方面，他认为读者有能力读懂作者叙述中的故事。例如，关于亚马孙女战士的传说，拉·孔达米纳无须解释何为“古代亚洲的亚马孙人”<sup>①</sup>，因为在欧洲人的知识背景下，希腊神话中关于亚马孙人的传说人尽皆知；他同样无须介绍征服者法兰西斯科·德·奥雷亚纳，因为他命名亚马孙河的故事家喻户晓。拉·孔达米纳直切主题，记叙自己探访奥雷亚纳声称遇见亚马孙女战士的地点，讨论她们是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的可能性，这样的叙述对于欧洲读者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读者也有可能对作者叙述中隐含的价值判断产生认同。拉·孔达米纳的第一批读者是参加法国科学院公众集会的听众，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本就是欧洲知识界的成员。接下来，他的读者群体扩大到法国、英国以及欧洲各国具有阅读能力的“阅读阶级”<sup>②</sup>。他们同样对道德与理性不会陌生。与文中特别提到粗鲁凶狠的英国海盗和西班牙征服者相对比，无论是在其报告的文字中，还是在行为举止上，拉·孔达米纳都表现出了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法国文明人形象，这使他的读者大为满意。例如，他将法国人沿安第斯山脉进入内陆的科学考察与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国作比较。“东南边穿过赤道的地方正是通贝斯港（Tumbez），西班牙人初次登陆征服秘鲁的地方，而从这里开始，我将背对南海，自西向东穿越整个美洲大陆。”<sup>③</sup>他叙述自己旅行的目的是为了“科学的进步”和“各国的共同利益”，法国人扮演的是崭新的道德使者。拉·孔达米纳所津津乐道的新的“征服”不同于西班牙人用血与火造就的“黑色传说”，而是“在路易十五治下的长久和平”中酝酿出来的，是敏锐智慧的科学研究者征服神秘难测的安第斯群山和亚马孙雨林、用纸笔和科学仪器创造出的文雅而高尚的“征服”。

虽然拉·孔达米纳的本意未必如此，但是他的旅行书写文本中确实暗示了一种对比的存在：他越是强调西班牙征服者的残酷，就越是能唤起读者对

<sup>①</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54.

<sup>②</sup> 详见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五章。

<sup>③</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11.

遥远而模糊的受害者即美洲原住民的同情，尽管这种同情是“极为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之所以说其是有限的，是因为在这场道德审判中，被施加同情的“受害者”身份的印第安人集体是高度凝练的，被物化成为一团悲哀而沉默的意象，对他们的同情不可能被同等地转移到具体的印第安人部落上或者其他殖民地的某一个被殖民群体身上。说其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只有当这种同情不会损害法兰西自身利益，而它又正巧符合民众心理预设中对竞争对手西班牙帝国的厌恶时，才会被民众所认同。拉·孔达米纳的叙事所引发的这种有限和有条件的共情，使得法国人能够暂时忘记法兰西帝国在世界的边缘进行拓殖活动时，不亚于西班牙的残酷性。最重要的是，和文雅的作者本人一样，他的读者坚信，拉·孔达米纳所代表的正是自己和全部法国人的形象：他们不仅是“人类的主人”<sup>①</sup>，他们还善于同情，富于道德和理性，是欧洲各文明中尤其风度翩翩的一位。

在这样的自我形象塑造的背后，一种鄙夷暴力庸俗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使一部分人与其他殖民者割席。在拉·孔达米纳的设想中，被剥离出来的可能是公众集会的听众、可能是全体法国人，但也可能是无限国籍的知识人。尽管最初的目的是为“法兰西荣誉”服务，但在拉·孔达米纳对建立物质世界秩序做出的努力以及对这些努力做出的解释背后，对立的两极并非是法国与西班牙（乃至欧洲其他国家），而是秉持着启蒙信念的知识人与其余人。这种对立之所以看上去发生在国家之间，一方面是因为拉·孔达米纳个人回报国王资助的政治需要和民族热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启蒙观念与法国文化高度重合、难以分离。更何况，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俨然被赋予了启蒙的象征意义。与其说拉·孔达米纳是在与同时代的一些人划清界限，不如说是在与停留在前启蒙时代的群体乃至与旧时代割席。

#### 四 殖民的道德面具

在以对理性的乐观态度为支撑的普世主义指导下，拉·孔达米纳完成了本次探险的各项科学考察任务，并且在旅行书写文本和演讲中以启蒙时代的

---

<sup>①</sup> 参见 [英] 维克托·基尔南著，陈正国译：《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话语对其进行解释。然而，启蒙的普世主义并不局限于物质世界，建立人类社会的秩序法则同样是启蒙知识人的使命之一。18世纪，帝国殖民征服的时代已经过去，逐渐转入对殖民地漫长的统治时期。对殖民地的掌握成为既定事实，但对殖民道德合法性的质疑依然存在，甚至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愈演愈烈。既然普适的真理是存在的，而人应当运用理性去追求真理，那么印第安人呢？真理适用于印第安人吗？如果适用，那么对印第安人追求真理、自由、尊严、价值等等的阻碍就会变成不道德的。如果不适用，那是因为印第安人无法运用理性，还是印第安人没有理性，抑或说，根本就不算是“人”呢？

启蒙时代以前对殖民道德正义性的争论都建立于同样的一个预设，即异教徒理应被基督教化，理应“迫使他们进入基督的国度”。而到了启蒙时代，随着宗教影响力的消退，此前不当预设的谬误日渐显露。如果说，神并没有降下旨意要求欧洲人征服异教的印第安人，那么，征服和统治的正义性何在？蒙特西诺斯曾经的质问被启蒙时代的知识人重新发现：“印第安人不是人类吗？他们没有理性的灵魂吗？”<sup>①</sup>问题到了必须要回答的时候，坚持真理普适性的启蒙思想家不可能容忍难以解释的例外存在。因此，像自然界一样，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一套规则和秩序，用以将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所有人类纳入世界运行的体系，成为知识人面对的崭新课题。

布丰是这一时期众多殖民道德体系理论建构者之一。他在《自然志》中提出的“美洲退化论”体系<sup>②</sup>，借助人类学、语言学和自然环境决定论，论证了美洲人种的天然劣势，进而为欧洲的殖民提供了完美的“道德面具”，“使善良的男女接受遥远的领地及其人民应该被征服的观念”<sup>③</sup>。作为布丰在法国科学院的前辈，拉·孔达米纳与之保持了良好的友谊，在布丰担任皇家花园（Jardin du Roi）馆长后，拉·孔达米纳更是将自己南美洲之旅收集的植物标本捐赠给他用作研究。布丰盛赞拉·孔达米纳“（有着）对科学的天才，对文学的品味，对写作的天赋，对进取的渴望，执行的勇气，完成任务的坚

<sup>①</sup> Carl Watner, “‘All Mankind Is One’: The Libertarian Tradition in Sixteenth Century Spain”, in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Summer 1987, pp. 295 - 296.

<sup>②</sup> Gordon S Wood, “America’s First Climate Debate: Thomas Jefferson Questioned the Science of European Doomsayer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44, No. 6, 2010, pp. 58 - 63.

<sup>③</sup>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页。

定,对竞争对手的友谊,对朋友的真诚,对人性的热情”<sup>①</sup>。布丰的“美洲退化论”体系并非凭空构想出来的,而是大量参考了18世纪美洲旅行者的旅行书写作品<sup>②</sup>,拉·孔达米纳的作品正是他参考的对象之一。在《南美洲内陆之旅简述》中,拉·孔达米纳对他遇见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并且已经开始思考造成印第安人与欧洲人巨大差异的原因。

拉·孔达米纳采用了接近于民族志或者说人种志的书写方式,描述了印第安人不同于欧洲人的习俗和性格,更尝试用理性解释这些区别的成因。与他对物质世界的态度类似,拉·孔达米纳也希望将印第安人纳入一个普适的人类社会秩序中。他指出,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在最初都拥有同样的祖先,因此印第安人的祖先也拥有微微发红的黄色皮肤或完全微红的皮肤,造成印第安人肤色不同于欧洲人的是他们所处的恶劣自然环境。“他们的肤色千差万别,主要应该归咎于他们生活的各地气候不同、空气温度也不同,赤道地带极度炎热,而白雪覆盖的地方极度严寒。”<sup>③</sup>不同的气候造就了印第安人各异的肤色,而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拉·孔达米纳认为同样也是自然环境造就的。

“自然似乎格外偏爱印第安人”,拉·孔达米纳指出,因为美洲的物产如此丰富,而河道的涨水和退潮甚至会将搁浅的鱼类留在亚马孙河陡峭的岸边,“可想而知,印第安人可以轻易地抓住它们”<sup>④</sup>。自然的偏爱导致印第安人无需付出太多努力就可以满足生活的需要,拉·孔达米纳认为,这导致了他们的普遍懒惰,而懒惰则使得印第安人对维持生计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他总结道,“我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有着同样的根本的习气,而这种习气的根源在于漠不关心……贪吃者满足于足量的食物;中庸者拒绝改变,即使是在必须这么做的时候,他们甚至拒绝去渴望;懦弱胆小的人不受美酒的激励,不受苦劳的威胁,不受荣誉、诚信抑或感激的驱动,而只关注于眼前的事物;即使下定了决心,也不顾虑未来,毫无远见和思考;即使不在枷锁之下,却

---

<sup>①</sup> Académie française, *Recueil des Harangues Prononcées par Messieurs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Dans leurs Receptions, & en d'autres Occasions, depuis l'établissement de l'Académie Jusqu'à Présent 1745 - 1761*, Paris: J. - B. Coignard, 1764, pp. 409 - 411.

<sup>②</sup> 关于“美洲退化论”的其他资料来源,参见王晓德:《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及其影响》,载《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36-153页、第192页。

<sup>③④</sup> 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25, p. 79.

过早地放弃，沉溺于幼稚的快乐……”<sup>①</sup>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拉·孔达米纳分析了印第安人使用的语言。他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充满能量、简洁、有感染力，这印证了印第安人性格的勤劳和无畏，而印第安人语言与欧洲语言中一些词汇的相似性，则证明了他们确实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祖先的子孙；但是，印第安人语言中缺乏表达抽象和宏大概念的术语。作为相同祖先的后代，欧洲人已经发明并且熟练运用了诸如“时间、绵延、空间、存在、实体、物质、身体……”等抽象词汇，但对于印第安人来说，“这些人在理解和阐释上简直没有进步”，“而且不仅是抽象、本质上的词汇，甚至是一些品质和精神上的词汇，他们也很难表达”。<sup>②</sup> 拉·孔达米纳认为，语言中这些词汇的缺失证明了印第安人根本没有进行抽象思考的能力，因而不可能“顾虑未来”，更不可能有“远见”和理性了。

拉·孔达米纳创造的是一个稍显粗糙但逻辑顺畅的解释链：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印第安人经历了外貌、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退化，因而尽管他们与欧洲人有共同的祖先，其人种发展却与欧洲完全不同。拉·孔达米纳的这番论证尽管不够严密和完善，却极富创见性。他忽略印第安人部落各自的独特性，高度概括为“所有这些人”，将他们“均质化成一个主语，一个集体的他们”<sup>③</sup>，而在遇到具体事件的时候，又将具体印第安人的特殊反应看作这个集体的普遍性特征。

这种将人类族群高度概括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将美洲印第安人进行去社会化的解读，并且将其归入自然的范畴。比如印第安人的毒箭，他没有将其解释为因领地受到入侵而产生的应激反应，而是完全否认了人类之间互相沟通、交流、甚至产生对抗的社会过程，将其直接归咎为印第安人的自然本性。他的论述被欧洲知识人所接受，并且最终为布丰建构其“美洲退化论”体系提供了支持。欧洲的知识人借助这样一种逻辑体系，不仅确认了印第安人的“他者”身份，更阐释了“他者”与“自我”之间巨大差异的形成原因，而这种巨大的差异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也是不可逆的。通过将印第安人社会自然化，将所有的印第安部落一概而论，找出所有被殖民者共有的劣根性，欧洲的知识人因此推理出殖民者加之于其上的统治的天然合法性。最终，

<sup>①②</sup> 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26, p. 27.

<sup>③</sup> [美]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译：《帝国之眼》，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82页。

人类社会与物质世界一样，成为有序、简洁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完美地解释印第安人的“低劣”，也可以完美地论证欧洲人的“高贵”，因而为旧的征服存在的道德难题作出补救，又为新的文化上的“征服”提供了难以辩驳的道德正义性。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拉·孔达米纳为殖民的道德正义性提供了不同于旧殖民者诉诸宗教的解释思路，但其具体的论证过程还未达到启蒙和普适的程度。从语言风格上来看，拉·孔达米纳不排斥使用包含强烈个人情感倾向的词汇，将印第安人的“他性”一概视为“劣性”，甚至在描述其人种时直接采用“退化”一词，暗示印第安人本源性地全面劣于欧洲人。此外，拉·孔达米纳同样无法避免采用旧式殖民探险与生存文学的一般思路，在其旅行书写和演讲中塑造了具有“异国风情”（exotic）的印第安人形象。例如，他详细介绍了从新格拉纳达迁徙到亚马孙河流域的奥马瓜人（Omaguas）<sup>①</sup>部落，他们“时常穿着披风”，还有“用两块板挤压新生儿头部的古怪习惯，以使得他们的头部形成一种奇怪的形状，更像（他们这么认为）是满月。”他们还“使用一种用芦苇做成的吸管，一头做成叉子的形状，就像一个‘Y’字，然后将插出的分支塞进鼻孔中”来吸食致幻类植物做成的粉末，“使他们24小时都醉意沉沉，整日沉浸在幻觉中”。拉·孔达米纳对这些行为的评价是“这种（生活）方式对一个欧洲人来说简直是荒谬可笑的”。<sup>②</sup>

拉·孔达米纳笔下的印第安人不仅生活方式奇异荒唐，还拥有乖张的性格。尽管他不否认印第安人有其勤劳、聪颖的一面，例如，原住民在马拉尼翁河上为拉·孔达米纳用棕榈制作了遮雨的凉棚，还想出了用藤条牵引船只防止搁浅的办法<sup>③</sup>，但他分析认为，印第安人的这些举动只是由于他们常年生活在雨林环境中，因而习得了在雨林中生存的窍门，而这些并非是什么需要经过理性思考才能解决的难事。更何况，印第安人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负面的性格：“印第安人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将毒药的原材料混合，并以最准确的方式遵循其祖先的指示……而绝不遗漏任何一点成分”以制作毒药，经拉·孔达米纳研究，这种毒药只要见血，受毒者“一分钟内必死”<sup>④</sup>。拉·孔达米纳感叹道，“任何一个人，都无疑会惊异于这些人如此精密地制造（毒药），是

<sup>①</sup> 即葡萄牙语中的坎贝巴人（Cambevas）。

<sup>②③④</sup> 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p. 36-37, pp. 17-19, p. 34.

为了满足他们的怨恨、妒忌和复仇心”<sup>①</sup>。这些新近改信天主教的人竟然会将毒药用于伤害传教士，而传教士本是“使他们柔顺”和“免于恐惧”的人。拉·孔达米纳同时还引用了一系列他听过的传说，例如印第安部落食用战俘的肉、残杀路过其领地的旅人等骇人听闻的故事，使印第安人“狡诈、恶毒而又忘恩负义”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异国风情”的展示中，拉·孔达米纳将印第安人作为审美的对象，为其赋予新奇的内涵，将其视为旅行书写中的调剂、吸引人眼球的插曲，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这类将解释与审美混为一谈的论述无疑与民族志方法相抵触，也无益于构建人类社会的普适秩序：在“退化论”体系中，拉·孔达米纳试图将印第安人概括为一个整体、一个“种”而为其赋予定义，将其置于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分类树中，成为“人”之“类”下的一员；而在“异国风情”的展示中，拉·孔达米纳又用夸张的笔触强调其不同之处，以至于使人怀疑其“人”性，将“种”差异无比放大，最终对他自己建构的人类分类层级形成了挑战。

尽管拉·孔达米纳试图以与物质世界相似的方式对人类社会进行分类和解释，但他的论述是不成熟甚至自相矛盾的。由于启蒙早期的时代背景所限，这一时期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理论还很不完善，以拉·孔达米纳的研究背景也不可能完成这种理论的创建，更难以独立进行此类研究。况且，将物质世界的秩序机械地套用在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种种困难。最后，应当强调的是，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秩序的建立是启蒙知识人对普适规律追求的体现，更是对万事万物综合统一的美感的渴望。尽管事实上造成了殖民地被纳入启蒙式的世界体系中并且不得不用启蒙话语来表达自己，但断言拉·孔达米纳受此影响并且把施行文化殖民作为科学探险和旅行书写的唯一目的，无疑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作为启蒙时代的知识人，以启蒙观念作为理论指导，以启蒙手段和话语来实践和解释自己都是无可厚非的。将拉·孔达米纳视为帝国文化殖民的代言人，控诉其苦心孤诣地加害于殖民地，显然是执果索因、时代错置。把拉·孔达米纳对印第安人的论述看作是受启蒙早期模糊的普适理想与旧时代殖民思维影响的、较为幼稚和原始的人种理论，才是更为合适的。

---

<sup>①</sup> C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 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 105.

## 五 结语

作为启蒙时代早期的知识人，拉·孔达米纳的殖民地科学探险和旅行书写充分体现了启蒙时代的独特视角。出于对非暴力、非迷信价值观的认同，拉·孔达米纳与其他科学研究者通过理性，运用这一启蒙时代知识人惯用的工具，从科学探险出发，致力于寻找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中的理论法则，试图建构协调、统一、简洁的解释一切的系统，并且用启蒙话语对其加以阐释，最终将启蒙价值观进一步深化和传播出去。在解释物质世界方面，拉·孔达米纳的尝试是较为成功的，但在解释人类社会方面则存在很大的不足。拉·孔达米纳仅是启蒙早期知识人中的一例。在其同侪的不断努力下，殖民地探险和研究愈发兴盛，最终导致强大的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欧洲对已成为既定事实的世界殖民格局进行进一步的解释、维护和理论更新。欧洲凭借文化上的“归化”和驯服，不仅说服了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欧洲民众，更使得任何一个被殖民者，无论是克里奥尔人、混血人还是原住民，都必须以欧洲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对被殖民者来说，唯一一种可能的反抗方式就是以他们习得的欧洲话语来论证欧洲话语本身的错误——这几乎是一个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悖论。后启蒙时代的人或许会发现，解决这种悖论的唯一方式就是建立起与之对抗的相对主义阵营，从根本上否定欧洲知识“共和国”的原初信念，即“存在全世界通行的固有法则”。然而这对于启蒙时代的知识人来说，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责任编辑 徐 睿)